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传播与产业化协同创新中心书系

中国纪录影像文库

主编 何明 副主编 郭净 陈学礼

神秘的河谷

独龙族民族志文献图片集

Mysterious River Valley

Ethnographic Photograph Collection of the Dulong

蔡家麒 王庆玲 著

民族出版社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传播与产业化协同创新中心书系

中国纪录影像文库

主编 何明 副主编 郭净 陈学礼

神秘的河谷

独龙族民族志文献图片集

Mysterious River Valley

Ethnographic Photograph Collection of the Dulong

蔡家麒 王庆玲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的河谷:独龙族民族志文献图片集 / 蔡家麒,
王庆玲著. —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6.9
(中国纪录影像文库 / 何明主编)

ISBN 978-7-105-14567-6

I. ①神… II. ①蔡… ②王… III. ①独龙族-民族
志-中国-图集 IV. ①K28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8503 号

神秘的河谷:独龙族民族志文献图片集

作 者 蔡家麒 王庆玲

丛书策划 郭净 陈湘

责任编辑 陈湘 斯陆益

书籍设计 吾要

责任印制 石小娟

图文制作 吴炤源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政编码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125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ISBN 978-7-105-14567-6/K·2552(汉 1436)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58130030 0871-65333080 发行部电话:010-64227665



蔡家麒

字伯文,江苏南京人,1935年12月生。民族学、宗教学硕士生导师,研究员。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先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及云南民族大学,长期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与教学工作。1958年开始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先后在甘肃、青海、内蒙古和云南等民族地区对保安族、鄂伦春族、独龙族、景颇族、傈僳族和彝族等做过田野调查。曾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民族学学会和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理事、云南大学客座教授、云南省政协第七届委员,现任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出版专著《论原始宗教》(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藏彝走廊中的独龙族社会历史考察》(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田野拾遗——文化人类学随笔》(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马背上的游猎生涯——鄂伦春族纪录片图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蔡家麒学术文选》(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田野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编辑原西南联大蔡维藩教授遗作《古埃及古希腊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合作出版《萨满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中国原始宗教研究资料丛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以及发表文化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和影视人类学论文与田野报告百余篇。

总序一

影像既是人类的意识活动和行为选择的生理性要素,也是人类的社会和文化的能动性构成。作为动物类的共同性,人类通过视觉等感官获取关于对象世界的影像即客观投射进行记忆存储与识别判断,以之为基础做出行为反应并建构关于对象世界的“信息库”。作为区别于动物的特殊性,人类超越了作为信号的影像的“投射—反应”单一功能,赋予其作为符号的无限广阔的能动性空间。马克思在论证人的活动的目的性和意识性时的比喻耐人寻味,他说:“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也就是说,人类不满足于影像的客观投射功能,运用能动性将影像转化为符合自我意向的主观影像,进而转化为创生性的图画、雕塑、建筑等人工影像符号。不仅如此,人类通过发明与运用望远镜、显微镜、X光、红外线、B超等以延伸自己的感官获得自然的生理感官所无法获得的影像,通过发明照相机、摄像机、电影、电视机、3D扫描仪等影像技术和设备以不断提高影像生产的能力、种类和水平。时至今日,影像技术属于更新最快的领域,影像产品跻身于产量最大的文化消费品行列,影像符号成为受众范围最广的媒介类型,人类已深陷影像的无底深渊之中!

影像符号凭借其能指与所指之间具有直观的对应性和直接的关联性的特殊优势而呈现出远远超越其他符号的爆炸式生产方式,把当今人类导向浅尝辄止的“快餐文化”。影像消费者们忙于饕餮丰盛无比的视觉文化大餐而无心深入追问与玩味影像所蕴含的意义,影像制作者们忙碌着完成应接不暇的订单而无暇系统分析与反思影像的生产过程,致使影像制作被装进神秘的“灰箱”而难得精致,影像消费沦为被动的“填鸭”而失去意义,最终结果则是爆炸式生产和抢购式消费的对象都是垃圾,让人类文化“消费至死”!

文字符号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缺乏直观对应和直接关联,需要通过艰苦学习和能动的意识活动才能联结起来。在“文化快餐”时代,文字产品在与影像符号的竞争中显示出巨大的弱势而趋于式微,然而却给人们提供了潜心学习的机会、沉静思索的平台和能动性展演的空间。吟咏四书五经的古典时代已成过往,但我们可能推动影像符号与文字符号之间的互动和互补,用文字符号诠释影像符号所蕴含的意义体系、反思影像符号的生产关系,在“影像热”中掺入些微“冷思考”,给影像符号添加几缕理性光芒,让影像生产萌生一点精致追求,使文化消费增加些微重量。这就是我们组织编辑出版《中国纪录影像文库》的初衷。

受编委嘱托作序如上。

何明

历史学博士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 博导

甲午年末于白沙河畔寓所

总序二

在摄影术发明之前,中国的各个民族,一直在用平面和立体的图像及造像纪录、传播着对于社会现实的视觉感受。1842年,借鸦片战争闯入天朝的西方人拍摄了有关中国的第一批照片。^①其后,随着19世纪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和外交官的到来,用照片和电影反映社会文化变迁的纪录影像也被引入中国。20世纪初年,在一些城市出现了照相馆,有些兼营电影制作,少数上层社会的家庭也玩起了照相机和电影机。民国历史虽然短暂,影像文化却异常快速地生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在救亡图存等理念感召下出现的边疆影像考察热潮。在这期间,杨成志、江应樑、凌纯声、庄学本、孙明经等一批学人用摄影和电影辅助学术调查;《良友》《中央日报》《文汇报》《申报》《民俗》《东方杂志》《旅行杂志》等报刊亦对边情民俗做了大量图片报道。加之抗战时期美军摄影部队在滇缅战场的影像纪录,都为后人认识那个动荡的大时代留下了丰富的作品和资料。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和民族大调查,早期民族志电影“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简称“民纪片”),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和民族研究者的指导下应运而生。到20世纪90年代,影像逐渐变成个人和学术表达的重要工具,当代民族志电影、独立纪录片运动

① [英]泰瑞·贝内特著,徐婷婷译:《中国摄影史(1842-1860)》,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

和纪实摄影突破思想的禁锢蓬勃兴起,为中国的影像文化开启了新的方向。而“乡村影像”经十年的磨砺,培育出了上百位扎根农村和牧区的创作者。他们的活动,不仅培育着地方影像志的新传统,搭建了多元文化对话的桥梁,也为“分享人类学”和“故乡民族学”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回首百年,纪录影像以其独特的方式,保存了中国文化变迁的历史记忆,也成为当代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但相较于实践的丰富多彩,该领域的学术探索却要滞后得多。民国时期的人们怀着紧迫的使命感致力于资料的收集和展示,影像研究在国内或国外均未形成专门的学科。从20世纪50—70年代,图片和电影创作都被国家包揽,配合民族调查而大量收集的影像既没有广泛传播,也没有深入研究,长期沉睡在图书馆中无人问津。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潮流的涌动,才有学者试图摆脱以往大一统的思维框架,寻找新的理论和方法。早年参加过“民纪片”摄制,后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电影组的杨光海先生,在一本美国的学术论著中发现了“民族志电影”的提法,他在1982年7月6日给云南学者徐志远的信里说道:^①

在国际上有民族志电影,美国已出版了民族志电影理论专著,日本民族学博物馆有数百部民族志影片,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只拍摄了十七个民族的二十多部影片,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民族电影可望振兴发展之时,又遭到了挫折,但我深信这不会长久的,我国的民族志电影事业是党中央制定的,它是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1982年,杨光海在《民族学研究》第三辑发表了论文《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的回顾与展望》,对“民纪片”的历史做了概括性的梳理,并再次表达了延续这项事业的愿望。在文章结尾,他提出如下建议:

在结束这篇短文时,我想对民族科纪片的名称提出个人的想法。现在通用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这一名称,是在1961年的一次座谈会上定

^① 这封信件的手稿由徐志远先生提供,在此深表感谢!

下来的,经过二十年的实践,这一片名不仅冗长,而且在一般人们的印象中容易与其他纪录片相混同,改名为“民族志影片”更贴切些,更能突出这类影片的性质特点。当前在国外也将这类影片称为民族志影片。片名的更改,还可以与国外同类影片的名称相一致,以利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①

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公开提出“民族志影片”(民族志电影)的概念。这一提议,反映了中国民族志电影正在发生的转折:国家机构不再成为这类影片制作的唯一主导者,而学者个人和学术群体的作为,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这之后,人们在理论和实践的两个领域都展开了积极的探索。1976—1981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电影组恢复民纪片的摄制。1985年中央民族学院拍摄了纪录片《白裤瑶》,第二年送法国真实电影节参展,率先打开了与国际影视界交流的大门。同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电影组的郝跃骏等人开始拍摄纪录片《生的狂欢》。1985年,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埃森·巴列克西(Asen Balikci)访问中央民族学院;次年,美国著名影视人类学家蒂莫西·阿什(Timothy Asch)也到该院访问,他们在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中带来了“Visual Anthropology”的学术概念。也是在1985年,中央民族学院学者李德君在美国《影视人类学通讯》(SVA Newsletter)发表《影视民族学在中国》(Visual Ethnology In China)一文,提出建设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影视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想法。^②到1988年,于晓刚、王清华和郝跃骏三位云南学者首次对“影视人类学”“民族志电影”的概念以及内容做出了全面阐述。他们以《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这篇论文,为中国的纪录片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从此,“影视人类学”和“民族志电影”的理论范式逐渐取代了“民纪片”的模式,成为学术评判的新标准。

1994年,云南大学历史系在肖锋、李国兴等投资人的支持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相关领域的专业研究和教学机构“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该所于1995年策

^①杨光海:《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回顾与展望》,见杨光海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资料汇编》(第一辑),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1982。

^②朱靖江:《影视人类学在中国高校的学科发展2——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载《影视人类学论坛》(电子版),2014(4)。

划和推动了“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的成立。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亦成立了影视人类学研究室。1999年,经过德国学者瞿开森以及我国云南纪录片导演郝跃骏、云南大学学者林超民等人牵线搭桥,德国哥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与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合作,申请获得德国大众基金会的资助,在云南大学开办了第一届影视人类学硕士培训班。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最早引进西方影视人类学学科教育的一次尝试。外方对这个项目极为重视,投入了当时堪称世界一流的数码拍摄、录音和编辑设备,并还提供了一流的图书和影片资源。参与教学的老师分别来自德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北欧,均为西方影视人类学界的顶尖专家。从1999年3月至2003年3月,两期培训班共培养了20名研究生。^①在此之后的十年里,这批毕业生分布到各高校和科研单位,成为推动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的生力军。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纪实摄影和纪录片创作(包括电视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进入繁盛时期。但这个繁盛,很快被新传媒技术和大众消费的狂潮淹没;而与此同时,以影像为主要手段的自媒体蓬勃兴起日益成长为突破思想禁锢的重要力量。

在这样一个人人可以制造视觉奇观的时代,快捷而方便的影像之眼,更需要文字的观照。如若没有文字对影像加以深刻的阐释和剖析,那视觉文化无论多么缤纷艳丽,都有可能变异成贫瘠的快餐,甚至像“圣战视频”那样,沦为替暴力推波助澜的工具。当然,唯有等待影像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奠基于第一手资料收集和田野调查,具有“自观”立场和“自省”色彩的理论研究才可能获得广阔的天地。可以说,这个转折点已经到来了。有鉴于此,我们在2013年联合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实验室、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影像民族志工作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清影工作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中心、广西民族博物馆等机构的学人,创办了《影视人类学论坛》(电子版)。在这个学术联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发起了首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

^①参见郭净、徐茵、徐何珊:《云南纪录影像口述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我们也用两年的时间策划了这套丛书,拟从学术的立场,对中国百余年间纪录影像的发生和发展进行初步的总结。我们希望通过丛书的形式,汇集有关纪录影像的研究成果和档案资料,既为深入的学术探索扎下根基,又为以影像为手段的社会实践探索未来的方向,并在写作和反思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相关领域的研究队伍。本丛书以影视人类学为基本视点,着重整理关涉中国的民族志电影、独立纪录片和田野调查摄影作品及资料,形成与影像互为解读的文本系列,并力图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多元与共享的“影像数据库”。

在此,对给予我们诸多帮助的朱靖江(中央民族大学)、鲍江(中国社会科学院)、雷建军(清华大学)、陈湘(民族出版社)、陆文东(广西民族博物馆)、吕宾(“乡村之眼”)、钟谨(上海大学出版社)等朋友表示忱挚的感谢!

郭净

民族史博士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序

这是一本关于独龙族田野调查的民族志实录,采用文字和图片并举的方式,改变过去那种以文字为主图片为辅(或作点缀)的做法,为的是让读者能够更为形象、具体地了解或研究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样式,试图将图片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提升到和文字一样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当年我携带的相机和胶卷都不够好,加之天气原因,未能取得应有的拍摄效果。

三十多年前的1982年5—8月,由我领队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三位同仁(杨毓骧、赵嘉文、和志祥)奔赴独龙江河谷,对沿江山居五千多人的独龙族做了三个月的田野调查,其间各人都有调查项目的分工。由于在出发之前作了长时间的充分准备,调查的项目比较明确,所以在田野中节省了时间。此前,亲履实地做过独龙江考察的有:清末地方官员夏瑚曾对独龙江及缅北地区的独龙人做过巡察,撰有《怒俅边隘详情》的呈折,成为了解清末独龙人生产生活状况以及改善其落后状况的对策之唯一文本;1935年我国民族学家陶云逵到滇西北和独龙江考察,著有《俅江纪程》一书,所记内容,特别是对当年滇西北地区地理交通环境与民族及族群分布的记述,极具参考价值;1956—1959年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怒江分组洪俊等对独龙族聚居区的社会形态做过调查,关于独龙族父系家庭公社的特征,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1960年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编导兼摄影杨光海和民族学家刘达成等曾深入独龙江河谷,拍摄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独龙族》,这是我国第一次运用电影手段形象生动地记录下独龙族社会生活之种种情状,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没有人类学专业人士到达此地对独龙族进行过调查。我们此行是想了解这二十多年后独龙族社会的

现状,此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我们先后调查了巴坡、马帕拉、朗汪夺、马库、迪东、孟登木、斯拉洛、腊佩、孔当、献九当、龙元、肯顶、迪政当、立木当、雄当等村寨。其间,杨毓骧同和志祥从独龙江上游徒步至西藏察隅县察瓦龙地区做调查,他们沿途历经艰险,是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家中首次行走过这条路线的人,杨毓骧撰写的《伯舒拉岭雪线下的民族》一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记有这趟不平凡旅程的经历。我回到所里将自己承担的调查部分率先写出田野报告,翌年12月刊于我所编印的内刊《民族调查研究》专刊第一集上,取名《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时隔25年以后,《藏彝走廊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将我的这份报告交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藏彝走廊中的独龙族社会历史考察》,该书中除文字报告外,有部分照片和手绘图。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今天四川、云南、西藏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北南走向的横断山脉之间被六条自北而南的江河: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所贯穿,这片地区学术界称之为“六江流域”,历史上是许多民族或族群你来我往之地,积淀着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我们这趟独龙江调查,也被纳入“六江流域”考察的项目之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民族学的田野调查装备很是简陋,那时一个调查组十几二十人能够配备一台相机是不容易的。当年我们去独龙河谷做田野,我用的是国产“海鸥”牌135相机,此时河谷正逢雨季,多数是阴雨天,有段时间连续下雨20多天,极少见到晴朗的天气,加之独龙族房舍里光线昏暗,这些都不利于拍摄。田野的全程,我拍摄了380余幅照片,虽然不够理想,但是一定程度上记录和反映了改革开放初始时独龙族社会生活与文化的现实影像,一直保存至今,觉得这些照片具有一定的存史价值。2012年我在编完《马背上的游猎生涯——鄂伦春族民族志电影图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后,即着手编撰此书。从380多张底片中选出197幅入编,并采用了1960年拍摄民族志影片《独龙族》时由已故的民族学家刘达成兄提供的36幅珍贵照片,作为本书的压轴部分,并写下每幅照片的“主题词”和若干相互关联的一组照片的“解说词”,编撰成这本志书。本书主要是想通过60年代和80年代初这233幅现场照片来

展示独龙族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变迁,让更多的人了解云南边疆这个人口很少的民族。读者若将这些旧照片同近期独龙族社会的一些新面貌做比较,自然会发现这个民族30多年来的变化,这就是纪实照片特殊的认识作用和研究价值。

图像语言和文字语言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述方式,利用照片或影片来还原、分析与研究一个民族、社会及其文化与通过文字进行研究当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一般来讲,照片记录的事实自有其客观性,不容更改,而文字记录的事实往往限于一定的主观性,有时可以更改;照片是通过自身的事物说话,文字可以超越事物说话。但是作为记录和呈现社会历史的照片,文字须紧扣照片中的事实进行解读,不可偏离。实际上两者在反映真实性的问题上,各有其优长,也各有其局限性,只有将作为视觉图像的照片与作为符号的文字有机地予以结合,方能相得益彰。至于影片和照片记录事物的区别,前者注重动态样式的进程,后者往往注意抓住事物瞬间的细节,两者也是各有所长,不容偏废。

我认为,民族志的图文集根据其范围与内容,不外是通过照片较全面系统地记录与叙述,或者专门对其中的某个方面做深入详细地描述,可大致区分为“综合型”与“专题型”两种。因此,编排的方式应是多种多样的。这之中照片按内容的科学分类、每幅照片的主题、一组照片的社会历史及文化背景和属于民族学方面的知识等,需要运用一定数量的文字来表现是不可或缺的,使读者能够看懂而有感于其中的文化意义,并能和自己熟悉的文化做些比较,起到照片应起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价值。我想,这应是编辑民族志图文集的基本要求。

传统民族学或民族志中经常有手绘插图出现,许多绘图具有对事物于外部难以看见的内部结构剖析、透视和解释的作用,这往往是照片难以做到的。本书附有9幅绘图,通过这些绘图,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事物的某些特征或功用。记得1959年1月我同保安族翻译两人去到青海同仁县调查保安族社会历史问题时,因为没有相机,只能手绘,将当地人的房舍、服饰、一些用具以及保安城堡及其自然环境等做了绘图。中学时代我学过一段时间的素描和写生,做田野时能够用得上,以弥补照片之不足。1965年杨光海在云南丽江地区拍摄《永宁纳西

族的阿注婚姻》影片时,采用了动画的视觉手段,据该片动画设计师郑成扬说,影片为了反映母系大家庭成员的居住情况,他画了一张各房间的平面图,逐个介绍这些房间的布局和居住的成员,说到哪一间,那间房间就亮起一盏小灯,观众一目了然,可见动画当是由绘图延伸而来。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调查,除了用文字、摄影、录音表现外,运用绘画这种视觉形象的手段来细化展示和说明事物的方式,不应忽视。

该次考察撰写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包括:一、生产技术活动;二、氏族、家族的传说、分布和通婚;三、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四、当代家庭生活;五、解放前察瓦龙对独龙族的统治;六、原始宗教;七、贡山县及独龙江公社有关资料摘抄等部分。全部内容已于200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藏彝走廊中的独龙族社会历史考察》,可以与该书对照阅读。

此外,以往民族志的撰写只记录和描述被观察群体的社会文化情状与事实,至于拥有另一种文化的调查者在田野中的种种活动、体验和感受,尤其是他们是怎样进入社区获得地方性知识等,在传统民族志里几乎没有他们的位置,这是同倡导参与性观察的实践精神相违背的。本书末附上的《独龙江河谷考察散记》一文,不仅记录被观察的对象,而且加入了调查者在田野中的一些活动与感受,这样的民族志可能是比较完整的。

本书图文的编选工作,云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王庆玲教授给予了很大的协助,多年来她对影视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做了不少工作,撰写并翻译出版了一些有关影视人类学的论著。

本书在内容选择、图片质量、文字表述和编排方式等方面,难以做到尽善尽美,这是要请读者予以批评和指正的。

蔡家麒

2015年7月13日于昆明翡翠湾知得斋

目 录

画外音/1

一 去独龙江河谷途中/3

二 沿江村落/24

三 农业 采集 工具/51

四 渔猎/66

五 纺织 竹藤制品 蒸馏香樟油/81

六 服饰 文面/97

七 建筑 居住/113

八 交通 学校/137

九 原始信仰与习俗/151

十 1960 年拍摄的照片/168

十一 独龙江考察手绘图/194

调查对象一览表/204

独龙江河谷考察散记/209

参考书目/224

Contents

Offscreen Voice/1

The way to Dulong River valley/3

Villages along the river/24

Agriculture Gathering Tools/51

Hunting & Fishing/66

Spinning and weaving Products of bamboo cane Vaporizing oil of camphor tree/81

Dress & Adornments Face tattoos/97

Huts Family life/113

Transportation Schools/137

Primitive belief/151

Photographs taken in 1960/168

Drawings in Dulong River field work/194

Table of interviewees/204

Stories of field work in Dulong River valley/209

References/224